

单极体系的维系与转变

——评《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

陈小鼎

内容提要 本文对英国学者巴里·布赞的近著《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进行了评介，认为布赞对结构现实主义与温和建构主义的分析路径兼收并蓄，把“权力结构”和“身份结构”两个基本变量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颇具新意的综合解释框架。布赞的解释更加合理地展现了单极体系维系与转变的动力机制，认识到社会结构对物质结构的导向作用有助于我们理解冷战后主要大国没有与美国进行直接对抗的深层原因。作者指出，布赞关于美国霸权与诸大国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政策建议，对中国应对单极体系的压力、减少崛起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和平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权力 身份 单极体系 中国崛起

一切科学研究始于问题。在国际关系领域，研究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通常是根据国际体系的基本格局和某个时代的具体特征确定的。冷战的终结既标志着国际体系的重大变革，也为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这是因

《国际政治科学》2008/2(总第14期),第105—116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为,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国际关系中第一次呈现出如此实力悬殊的格局,即美国拥有了压倒性的全球权力优势。在这种背景下,单极体系的主要特征、运行机制及变迁动力,自然成为国际关系探讨的焦点。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涌现了大量关于单极体系的维系与转变的研究,为各种理论流派进行检验和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在这类研究中,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的近著《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就是一例。该书框架简明、论证有力,为我们理解单极体系的变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无论是在理论分析还是政策启示上,都值得进一步挖掘。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关系纷繁复杂,变动不居,如何真切地捕捉世界政治的内在动因,探寻国家间关系的规律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问题。可以说,国际关系学的进步都源于对这个问题的不断解答。无论是作为学科奠基者的卡尔·摩根索,还是发展者的沃尔兹、基欧汉、温特等学者,都以独特的方式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从而确立了他们的理论地位,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

与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国际关系现象之间存在着无限多的联系,这种多样性对于任何无前提知识的认识者来说都是一个混沌的世界。如果我们试图对研究对象形成准确的认识,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出发点,以便构建清晰的理论地图,剖析世界当前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许多国际关系理论以一个简单的概念为基点,为我们呈现了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基本面貌。比如,沃尔兹以“权力的结构分布”为出发点,得出了均势政治周而复始的规律;亨廷顿以“文明”为基本分析单位,指出了“文明的冲突”是冷战后世界的基本态势;民主和平论者以“民主”的合作属性为依托,预示了政治身份分布对世界政治走

Ethan B.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向的重要影响。由于这些理论地图简洁清晰,集中揭示了某些因素的主导作用,成为我们认识国际关系的重要出发点。作为构思出来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理论地图应当在现实和抽象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如此才能有助于判断国际关系运行的基本趋势。一旦过于贴近现实,只能使我们淹没于无穷的信息当中,无法得出明确的因果结论,陷入茫然;如果过于抽象,往往流于空想,因果关系再简明有力也无法证实,更谈不上预测未来。

正是在综合、借鉴上述理论的合理要素,同时又充分重视理论的抽象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平衡的基础上,布赞规划了自己的理论地图——极与身份的互动,强调社会结构对物质结构的导向作用,以此剖析 21 世纪世界政治的基本动力。

冷战结束不久,美国以唯一超级大国的身份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国际关系进入了单极时代,如何应对权力格局的转变成为各国尤其是大国所要谋划的战略议题。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往往从“权力结构”和“身份结构”这两个视角来解释单极体系的维系与变迁。结构现实主义从“权力结构”入手,认为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无法持久。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各国的首要关切,各国尤其是大国十分关注权力分布及各自在体系中的位置。尽管美国霸权改变了权力结构,但是无法动摇国际结构的运行规则——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助”原则。权力差距的拉大势必引起大国对安全的担忧,必将以某种方式抑制霸权,要么通过提升国家实力实现内部制衡,要么组成反霸联盟实现外部制衡,或兼而有之。总之,均势的再现是结构逻辑的必然要求。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阵营的学者则倾向于从身份结构出发,认为美国以其独特的价值观塑造了共享的社会结构,维护霸权治理的合法性。只要美国能够有效地维护民主同盟,实现共识之治,单极体系仍将长期维持。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Bruce Russett ed.,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2000, pp. 24—37.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 pp. 210—214.

在布赞看来,两种路径都具有合理之处,然而,将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割裂开来的做法显然忽视了二者互动的重要性,这一缺陷在分析单极体系时尤为明显。这是因为,单极体系的演变恰恰孕育在物质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互动之中。冷战期间,两极规定着人们对世界政治进程的全部理解,这是由于美苏的对抗不仅是权力的对抗,也是意识形态的对抗,物质结构与身份结构重叠在一起,因此,无论从哪个视角入手,都可以得出正确的解释。而在今天,权力结构与身份结构的结合相当松散,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注二者的互动。作为权力的静态分布,传统的极理论已经无法真实地反映全球体系的现状,更无法提供价值规范,因此,无力解释体系的互动与走向。如果仅仅从身份入手,就很难解释单极体系中“超级大国”的独特作用。鉴于此,布赞以“极”和“身份结构”为基础,建立了综合性的解释框架,剖析单极体系的特征,揭示这一体系演变的可能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从而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提供了一种清晰的认识和判断。

二、极与身份:单极体系的基本维度

作为衡量体系层面权力集中程度的分析工具,“极”的概念对于判断结构特征、揭示国际互动和国家行为的趋向具有重要意义,其作用在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探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不过,随着国际关系的拓展,传统的权力界定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现实。因此,与沃尔兹从权力的结构分布来理解极的做法不同,布赞重新界定了极的划分。

自20世纪初期起,国际关系从欧洲体系拓展到全球体系,国家的互动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欧洲国际体系下,区域权力分布等同于体系权力格局,国家交往密度较高,欧洲大国同时也是体系大国而成为一极。但在全球体系中,我们还应当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各种阻隔,考虑到大国的投送能力,进而分析其是否具有全球影响力,能否成为体系的一极。作为体系层次的概念,极作为权力的位置排序已经很难真正反映全球体系的现实,应当有所调整,更加侧重极背后的权力本身,只有具备了全球影响力的国家才堪称一极。否则,尽管一国在权力排序上靠前,也不应该视其为一极。以此为出发点,根据影响力的范围

与强度,布赞把国家划分为超级大国、大国、区域大国、一般国家等四类,以便清晰地反映全球体系的权力生态。

所谓超级大国,必须拥有影响全球政治、军事和经济的能力,尤其应当在全球的军事、政治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所有地区的安全化与非安全化过程中充当积极角色,即不论作为威胁者、确保者、盟友还是干预者,该角色都能获得认可,尤其是自我认同和其他大国的认可。在全球体系中,只有具备全球影响力的超级大国才真正拥有极的地位。而作为大国的要求则有所降低,只要拥有进行跨地区活动的能力,并有潜力跻身超级大国的国家就可以称之为大国。依此类推,地区大国主要指影响力局限于区域层面的国家,如南非、巴西等。对国家地位的划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全球体系的权力分布和今后可能的走向。

布赞认为结构现实主义的“极化”思维过于狭隘,仅仅揭示了权力的静态分布,没有恰当地界定“极”的标准,不能真实地反映权力层级,无法适用于今天的全球体系。因此,他建议细化权力结构,从超级大国和大国的角度来衡量体系的现状与未来,从而洞察体系维系和转变的动力机制。当然,极仅仅只是认识国际体系的一个视角,无法为我们可靠地理解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提供充分的知识。只有与身份结构联系起来,极的理论才可能以相对简洁的方式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复杂性。这是因为,身份结构界定了国家的预期与互动规则,揭示了体系变迁的维度,有益于我们探索单极体系的内涵与走向。

关于身份结构,布赞基本上采纳了温特的敌人、对手和朋友的模式来分析当前国际社会的身份分布。身份结构的形成取决于国家自我构建时所使用的意识形态程度、具体特征及与其他主要国家意识形态的兼容性(即支持、中立还是反对)。在此,作者强调,意识形态的同质性虽然重要,但意识形态的具体特征更为重要,因为它决定了国家具体的价值取向。布赞认为民主的意识形态较之于非民主的意识形态更倾向于合作,而且他试图通过比较冷战时期资

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第71页。

同上书,第43页。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383页。

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第26—27页。

本主义阵营的和平相处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冲突(中苏对抗、中越边界冲突等)来论证这一点。当然,要作为一个有效的解释变量,身份必须解决稳定性问题,否则无从入手。布赞通过身份的形成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考察了强制、考量(关于利益的理性计算)、信念的内化(合法性)等身份形成方式,认为由三者所形成身份的稳定性在逻辑上依次递增,一旦形成便可能沉淀下来,凝聚成身份结构,其稳定性并不亚于物质结构。

通过上述论证,布赞确定了身份作为体系基本解释变量的地位。身份结构意义重大,由国家身份所形成的国际社会结构,其具体特征、稳定与否对权力结构的运行起着重要作用。权力格局只有置身于特定的国际社会结构中才有意义,我们才能由此判断国家行为的意义与体系的特定内涵。社会结构对物质结构的运作存在明显的导向作用,在此基础上,布赞根据权力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对未来的国际政治格局做出了预测。

他认为,格局的维系与转变既受到超级大国和大国数目的影响,也受制于相互间的社会关系。其中,超级大国的数目、具体身份特征及兼容性对体系的演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可预见的未来而言,布赞认为“一超多强”仍然是最有可能的格局,将维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种格局下,大国首先顾及与超级大国的关系,超级大国的地位因此得以巩固。与此同时,大国之间呈现出相互防范的态势(尤其是在缺乏共享价值的相邻大国之间),区域安全压力有所上升。有鉴于此,美国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发挥权力的杠杆作用促成大国间相互制衡,维护自己的权力优势;另一方面强调身份结构的重要性,推动美国价值的普世化,形成共享的社会结构,促成霸权秩序的合法化,从而防止大国反美同盟的形成,实现“霸权护持”的战略目标。

当然,超级大国的数目也可能增加,形成存在两到三个超级大国的格局。通过对大国的比较,布赞认为欧盟、中国最有可能成为未来超级大国的候选

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第21页。

同上书,第25—27页。

同上书,第90—95页。

Josef Joffe, “‘Bismarck’ or ‘Britain’? Toward 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fter B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1995, pp. 113—117.

者。中国的崛起将与美国以对手之间的竞争关系出现,但不会重现美苏对抗时期的敌对关系。由美欧所组成的超级大国体系,相互间的价值共享程度较高,可能呈现“朋友型”结构。如果美、欧、中并列三强,中国抗衡欧美的可能性相当小,很可能采取“搭便车”的策略,意识形态较为和谐,处于对手与朋友的社会结构当中。当然,近期内很难出现超级大国数目增加的可能,这需要经过一个长时期的酝酿。

最后,布赞提出了一个颇有新意的格局:一个只剩下大国的世界。在这种格局中,体系层次的互动较弱,地区的作用得到了凸显,大国主要关注区域关系,世界政治完全区域化。同时,作者也指出这种格局出现的可能性很小,除非美国自愿放弃扮演超级大国的角色。

综上所述,单极体系的维系和转变取决于美国和诸大国之间的权力互动和身份互动。美国的所作所为将对体系的演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美国继续奉行单边主义、超常安全化(如先发制人、外交手段军事化)等帝国行为,将破坏美国在战后建立的多边制度体系,严重损害霸权的合法性,造成同盟国的分裂,推动反美同盟的形成。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在国际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但美国的自我定位将对国际社会结构的维系与转变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美国继续在对手和朋友的结构中玩弄敌人和对手的游戏,必然造成国际对抗的加强,引发制衡的强化,从而危及美国的霸权地位。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布赞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忠告:美国应当明智地认识到霸权合法性的重要作用,努力实现“制度霸权”而非走向帝国的“过度扩张”;诸大国尤其是英国应当扮演“忠实反对者”的角色,支持美国的领导,同时抵制美国超常安全化的帝国倾向,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总体上,作者的主张是要努力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他对美国帝国倾向的批评用意不是否定美国的作用,而是希望它能够以良性的方式来发挥作用,从而维护“美国治下的和平”。

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第113—123页。

同上书,第159—162页。

同上书,第197—200页。

三、学术贡献及缺失

纵观全书,布赞的理论分析背后隐藏着这样的逻辑:在物质结构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体系的维系和转变主要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变迁。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维持,有赖于霸权合法性的塑造与巩固。同时,就体系的转变而言,大国的崛起也受制于其身份的具体特征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兼容性。在敌人的结构下,霸权战争往往是体系演变的动力,是崛起的主要方式;而在对手或朋友的结构中,构建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规则是大国顺利跻身超级大国的重要途径。总之,在权力差距难以短时期内消弥,其他大国很难与美国进行正面较量的情况下,超级大国与诸大国在国际社会规则方面的塑造与争夺成为体系演变的基本动力。

单极体系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对其维系和演变的研究尚在探讨和争论之中,布赞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我们对于单极体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在解释框架、解释力度与政策建议等方面颇有创新,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建立综合解释框架是该书最大的特色。作为理论多元主义者,布赞对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两个基本变量进行了相应的整合,形成了新的解释框架,可以说实现了重大的理论创新。国际关系错综复杂,解释变量过多不便于人们对因果关系的把握,而单一解释变量无力对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做出全面的解释。然而,理论构建必须对现实进行必要的忽略和抽象,如此才能形成强有力的因果解释机制,否则只能流于泛泛的描述。这就要求理论构建必须拥有独特的理论归属,最大限度地体现某一解释变量的作用。而综合解释框架既不是理论的实际运用,也非层层描述,恰好处于它们之间的空间里。布赞无意于构建简明的因果理论,而是尝试进一步探析体系维系和转变的动力机制,因此对结构现实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的分析路径兼收并蓄,糅合二者的解释变量,把物质结构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构建了一种综合解释框架。这种综合性理论论证了社会途径在单极体系演变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了进一步的问题转化,相

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第82页。

对于其他两种分析路径各自的缺失而言,这种综合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其次,社会结构对物质结构的导向作用解释了制衡缺失的深层原因。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自助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原则,出于国家生存的考虑,单极势必引发某种形式的制衡,无法持久,体系终将回归均势。但是,当前的美国霸权并没有引发相应的制衡,如何解释“制衡缺失”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命题。学者们做出了各种解释,比如,沃尔福思(William C. Wohlforth)的“制衡门槛说”和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的“霸权独特论”分别强调高昂的制衡代价和美国霸权的独特性削弱了制衡动机。布赞并不否认这两种解释路径的合理性,尤其赞同美国霸权的良性特征,但认为它们不够全面、过于静态,没有充分解释制衡缺失的内在原因。布赞的“极”与“身份”互动的理论地图则解释了制衡缺失的主要原因:美国塑造并维持了介于“对手”与“朋友”之间的国际身份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节制了美国的帝国冲动,多边治理成为美国霸权的主要影响方式,从价值形态上内在地缓解了他国的制衡动机。因此,作者认为,是否制衡美国不仅仅取决于制衡门槛的高低,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美国能否把自己的行为限定在“朋友”和“对手”的框架中,通过多边协商的形式实现霸权治理。一旦美国越过了这个界限,玩弄敌人和对手的游戏,将触发制衡的反应。“9·11”之后,单边主义、外交军事化等蛮横的帝国行为,已严重破坏了美国在过去半个世纪内所建立的国际社会结构,削弱了霸权的社会基础,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布赞也由此对美国提出忠告,如果美国的帝国行径持续下去,很可能引起大国的制衡;在权力制衡不可行的情况下,大国可以通过改变国际社会结构来抵制美国,甚至西方大国可以威胁终止联盟,从根本上挑战霸权的合法性。总之,其他国家的制衡行为取决于美国的作为,当前制衡的缺失是由于美国所塑造的社会结构虽受到很大冲击但并没有解体,仍然维护着美国霸权的社会基础。

最后,根据社会结构的重要性,作者对美国 and 诸大国提出了颇有新意的政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the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1, 1999, pp. 1—36;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

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第178—179页。

同上书,第197页。

策建议。其中,作者着重指出,美国政府应当明智地意识到社会结构在霸权护持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拓展共享的社会结构,塑造并巩固霸权的合法性,实现与诸大国的良性互动。同时,诸大国应扮演“忠实反对者”的角色,一方面在原则上明确支持美国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坚决反对美国的帝国行径和诉求,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在单极格局下,各国很难对美国实行有效的权力制衡,但诉诸于社会结构却往往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美国权力的作用方式及目标范围,维护现有秩序。这样的政策建议一方面与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并不矛盾,另一方面也能取得各大国的支持,有很强的政策操作性。21世纪的世界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与诸大国的身份互动,当然能否形成大国间良性互动的局面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所作所为。无疑,作者的建议值得深思。

当然,作为一本试图建立理论地图以解析21世纪世界政治的基本规律的著作,由于其宏大的理论抱负,不可避免地也存在一些缺陷:

第一,作者建立的综合解释框架在理论兼容性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布赞糅合了权力与身份这两种解释路径,但未能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冲突,极易产生理论内耗,损害解释的效度。该书突出了身份结构在解释单极体系维系和转变上的作用,但这只是在权力差距较大并且不易改变的前提下才有解释力。一旦物质实力发生明显变化,就有必要重新思考社会结构的解释作用。可见,该解释框架未能全面处理好权力与身份之间的动态关系。如何处理好权力变量和身份变量之间的交叉与冲突之处,尤其是物质力量对身份结构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解决。

第二,布赞没有很好地解决身份结构转变的问题。尽管他一直在提醒我们,美国的帝国行为将造成国际社会结构的转变,但在如何转变的问题上始终语焉不详。如此一来,作为基本变量的“身份结构”缺乏变化的维度,将影响到理论的解释力和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

第三,在讨论“一超多强”格局下的大国战略关系时,布赞忽视了核武器对大国互动的影响。在核时代,大国间的对抗被核武器的毁灭作用限制在不敢进行全面战争的水平之内,大国的战略关系考虑发生了变化。因此,“一超多强”

巴里·布赞:《美国 and 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第201—202页。

同上书,第193—195页。

格局的维系在权力与身份结构互动的解释之外,核武器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总而言之,布赞所构建的“理论地图”以简洁明了的方式,深刻洞察了单极体系的实质,揭示了美国与诸大国在权力结构与身份结构上的互动决定了世界政治的未来,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丰富了我们对于单极体系的认识,为大战略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起点。该书瑕不掩瑜,并不妨碍其整体上的理论洞见和现实意义。

四、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诚如布赞所言,无论从哪种途径剖析 21 世纪的世界政治,中国都是叙述的重心,也是最大的问号。就物质力量而言,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崛起势必成为美国最大的隐忧;从社会结构来看,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虽然强度远逊于美苏,但在当前却相当突出。中国的崛起给单极体系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带来了外界尤其是体系主导大国的猜疑、牵制,稍有不慎,崛起进程就很可能为外部压力所打乱,甚至被扼杀在萌芽之中。

由此看来,如何正确应对单极压力,尽量减少崛起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和平发展就成为中国外交至关重要的战略议题。就这本书的启发而言,以下几方面值得重视。

首先,成功的大国应当能够提供为国际社会所分享的价值体系,形成共享的身份结构,通过制度化途径合法地满足国家利益。这是正处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必须思考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带来国家实力的增长,引起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的警觉,如果中国能够形成与各大国间的“朋友型”或“对手型”而不是“敌人型”身份结构,就可以消解力量增长带来的潜在威胁,与世界和平相处。一旦处理不好,成为国际社会的对立面,力量增长的幅度越大,其他国家所感受的威胁也随之增强,从而采取措施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鉴于此,中国应当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和主导大国之间的身份兼容性问题,至少争取避免陷入相互否定的敌对状态之中,尽量求同存异,拓展共识,其中最

见作者所作的“中文版序”。

重要的是处理好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这两对关系的处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是对中国的重大考验。只有处理好了这两对关系,才能超越历史,避免战争崛起的历史宿命,实现和平崛起。进一步而言,中国应当树立明确的国际社会观,回答崛起之后的中国将带来什么的问题。如此才能给世界一个明朗的预期,充分展示中国和平崛起的诚意,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疑惧。“和谐世界”的提出是一个很好的宣示,值得深入和更细致的引申。

其次,身份的具体特征决定国家的价值取向,因此应当重视国家的内部建设,培育良好的大国心态。在提升物质实力的同时,积极发展“软实力”,增强对他国的吸引力,形成“和平发展”的政治文化,避免滋生狂热民族主义,如此才能理性地处理国力的增强并取得信于世界。

当然,布赞所提出的“忠实反对者”的角色并不适合中国。布赞认为,大国的“忠实反对”可以维护霸权的良性运行和国际社会的稳定,这对于美国的西方盟国或许可行,但由于美国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挑战国,中国扮演这一角色既无法取信于美国,显然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双方的基本定位是“对手”而非“朋友”。朋友的善意反对可以得到美国的理解,而对手无法做到这一点。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中美之间可以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而做出相互协商、相互调整的战略互动。

总而言之,布赞开创了一种新的理论地图,为我们剖析单极世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值得进一步挖掘,拓展相关研究,增强理论的适用性。其中,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是这一理论地图的重要检验案例,值得中国国际关系学人深入研究。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the U. S. -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pp. 49—78.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第10—15页。

作者简介

聂军 襄樊学院政治与法学系副教授。2002年在陕西师范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7年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xfniejun@126.com

王海滨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电子信箱: wang-hb05@mails.tsinghua.edu.cn

田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1998年、2001年和2004年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著有:《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2006年)。

电子信箱: tianye@ruc.edu.cn

孙学峰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1997年和2000年在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分别获得法学学士、硕士学位,2006年在清华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著有:《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合著,2007年)、《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合著,2005年)。

电子信箱: sunxuefeng@mail.tsinghua.edu.cn

杨子潇 清华大学中文系2004级本科生。

电子信箱: youngzshower@gmail.com

陈小鼎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2005年在兰州大学国际政治系获学士学位,2007年在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获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 xiaoding@mail.nankai.edu.cn

周方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1992年在华中科技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8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06年在清华大学获国际关系博士学位。著有:《国际问题数量化分析》(2001年)、《东亚安全合作》(合编,2004年)。

电子信箱: zhoufangyin@gmail.com